

# 记忆、土地与他乡的召唤： 论张系国的“土地游魂”

伍燕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 摘要

1949年，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败退并从中国大陆撤退至台湾。许多中国人随从国民党从此远赴他乡并定居台湾。张系国亦在五岁那年随同家人来到台湾生活。事实上，国民党多么渴望有天能够回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然而这却是个一再落空的梦想。这个事实使到当时许多台湾外省人彻底失望。一直以来，当年移居台湾的外省人都极度渴望有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去。他们认为这次的败退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分离，而他们同时亦无法承认台湾，甚至对台湾的“身份”感到疑惑。这种被家乡遗弃的感觉当年曾一度在张系国心中升起，因此他心底难免会存有一股远离家国之外的孤寂感。张系国于是决定于1969年离开台湾远赴美国深造。然而，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张系国的写作风格，尤其在张系国于八十年代的写作丰盛期，他的写作可以看出一次转折性的改变——他尝试把自己的位置还原到他称之为“家国”的层次上来。此论文即是从张系国早期作品来探勘他书写中的离散意义。

**关键词：**张系国、留学生文学、流亡、离散、身份认同、家国

# Memories, Homeland and the Call from a Distant Land: On Zhang Xiguo's "Drifting Soul"

Ng Yean Leng (Lecturer,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 Abstract

In 1949, the Nationalist Party (Kuomintang) retreated to Taiwan after it suffered defeat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inland. Many Chinese residents followed. Among them was Zhang Xiguo who moved with his family to Taiwan at the age of five. Though the Nationalist Party had hoped to retake China after its retreat, this remained an empty dream and caused much disappointment among the Taiwanese residents, many of whom had thought that the retreat was only temporary and had hop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land one day. They did not recognize and were confused over the status of Taiwan. Zhang Xiguo himself felt banished by his homeland. This loneliness influenced his decision to further hi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9. This decision greatly influenced his style of writing. By the time he reached his peak in the 1980s, his writings showed a fundamental change as he tried to put himself in a place he called his "homela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factors of exile reflected in Zhang's works.

**Keywords:** Zhang Xiguo, foreign scholar literature, exile, diaspora, identity, home-

## 引言

张系国是坐镇台湾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六十年代初期，从於梨华等无根一代延伸到白先勇纽约客的文化危机，留学神话顿时成了残酷的现实梦魇，深深笼罩自六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末的海外学人。张系国，同辈学人/写作人白先勇称他为“第三代留美作家的中坚”，确实有意说明他象征一股新力量向旧有的留学生文学告别。<sup>1</sup> 1966年赴美深造两年后，《地》（1968）一书首先为张系国稳扎留学生文学的要领，随后《香蕉船》（1976）和《不朽者》（1983）共有的12短篇合集为《游子魂组曲》，一路铺就海外游魂的哀歌，而这期间的长篇《昨日之怒》（1979）更以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来审视文化身份的归属问题，企图替张系国这一群海外学人寻找安身立命之处。究其实，张系国的“留学生文学”来到八十年代初期确实经已完成，加上较之白先勇、王文兴这等喧嚷于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家，他的作品确实无法让人眼前一亮，尤其当许多论者大都围绕在他是个“文以载道”、“感时忧国”的文化背负者身上展开论述，更是一再忽略了他的书写艺术。<sup>2</sup> 然而，时过境迁，再回到谈论留学生文学这“荒谬文学”难免会有陷入自怨自艾的窠臼之嫌。<sup>3</sup> 然而，正因为张系国一路肩负沉重的文化包袱，致使我们无法忍心漠视他书写背

---

1 1981年，以海内外华文文学为主题的新加坡国际文学研讨会上，主讲人之一的白先勇曾探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中国作家，并将他们的写作时期大约分为三期：“早期有於梨华，曾经以留学生的困境为主题，写出了无根的一代”，中期的代表作家比较多，其中以丛苏为代表，“写出了现代人的焦虑、惶恐”，而“张系国是第三代留美作家的中坚。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有独特见解及敏锐观察。”

参阅白先勇，《新大陆流放者之歌：美、加中国作家》，收入白先勇，《明星咖啡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年，页35；另外，张系国对“留学生文学”叙述题材的自觉，可以从他自己的评论文章——〈谈写实主义〉一文看得出来。他表示：

“台湾出来的留学生，在国外会碰到其他地区来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华埠的老华侨，土生土长的下一代华侨青年。他们中间的关系如何？本省籍的留学生和外省籍的留学生，关系又如何？这些都可以写，值得写的题材。如果朝这方面发展，留学生文学，绝不至于像目前这样的贫乏。”参阅张系国，〈谈写实主义〉，收入张系国，《让未来等一等吧》，台北：洪范书店，1987年，页99。

2 龙应台强调：“不管张系国承不承认，高不高兴，他确实是一个文以载道的作家。”参阅龙应台，〈画猫的小孩：与张系国一夕谈〉，收入龙应台，《龙应台评小说》，台北：尔雅出版社，1985年，页203；另，李欧梵以〈奇幻之旅〉为张系国的《星云组曲》作序时，也一再围绕在他“文以载道”和“感时忧国”的写作情怀中展开论述。李欧梵指出：“我觉得张系国仍旧属于科幻小说中的‘文以载道派’……”。参阅李欧梵，〈奇幻之旅——星云组曲简论〉，收入张系国，《星云组曲》，台北：

后的意识形态。1949年大陆变色，国民党迁台所铸造的历史记忆，更使他这个外省第二代作家一直在家乡（台湾）和他乡（美国）两个端点上游离。历史时空架构之下，张系国其实一再重申书写他和土地之间的辩证关系。张系国的《地》、《游子魂组曲》（《香蕉船》和《不朽者》）以及《昨日之怒》可算是曾经主导台湾留学生文学的三部曲。于此，这篇论文尝试从“离散”的观点切入，重新探讨张系国此三部小说中台湾外省第二代尤以知识分子为主，在建构土地主体性过程中所延伸的文化身份问题。

## 二 历史与空间的辩证：张系国何处落足

“土地”是牵系人类情感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更可谓写作者最原始的书写动力。始自《诗经》谢天谢“地”的丰收画面、《离骚》、《涉江》中诗人屈原的放逐印记，土地不啻是书写，也是被书写的创作主体。土地居于文学文本里一个重要的叙事位置，它不仅是一片具体的地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土地经已成为作家关心家国、民族命运的书写媒介，它的出现/失落总是与作家们的脉搏紧紧相扣。作家站在属于自己熟悉的地方来说故事，从中思考许多与生命和精神本质相关连的问题，以及关心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命运。因此，土地在这里成了一个重要的写作命题，让作家们在地域文化各异的主体位置上为读者捏造了不同的想像空间。中国现代小说中这样的说故事者不计其数：鲁迅《故乡》、《阿Q正传》、《祝福》里浙东村镇封建落后的小人物；贾平凹笔下勾勒的“废都”文化无疑存有家乡商州的影子；沈从文的《湘西》、《边城》也离不开湘西浪漫淳朴的人情风土；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家乡婚事；黄春明《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里对乡土的热切召唤，都割切不了家乡各色人物的嘴脸。同时，当代众小说家亦可作如是观。莫言生活在山东高密的“我爷爷”和“我奶奶”；苏童笔下南方的香椿街、梅雨和妓院；王安忆迂回穿越于上海弄堂里熟悉不已的“王琦瑶”身影；老灵魂朱天心漫游古都台北的大街小巷，显然是作家藉自家的土地为演绎空间。与此，立足土地之上而延伸的“恋乡”情结，又或者因土地失落而起追念之情，甚至重新构塑原乡使其面貌还原，土地的出现/不现/再现都是一条缠缠纠绕且砸不开的链锁。

自19岁第一本长篇《皮牧师正传》（1963），张系国接踵而来的小说无论

3 “荒谬文学”是张系国自己的用语。参阅张系国，《地》，台北：夏林含英，1979年，页252

是创作数量，还是题材的关怀层面，都不失为台湾当代文学甚具成就的亮丽名字。从他的生命历程观之，可见他生命中最单纯的年少岁月是在台湾这块土地度过的。五岁时随父迁台至21岁的大学教育，张系国人生中部分记忆和经验都可以说是“吃台湾米、喝台湾奶水长大”，而这段从年少到大专时期与台湾社会相濡以沫的生活和教育，恰是为他往后的书写生涯铺垫了极之可贵和重要的思想底蕴。22岁以后离开台湾到今日毅然选择居留美国彼岸，张系国对台湾的记忆仿佛仅是17年里稚嫩青涩的惨绿岁月，以及日后从彼岸断断续续归家时的臆想和感触。然而，仅凭这些早时的零碎片段，张系国却写出了对台湾土地浓烈的情感。相对于当时七十年代乡土作家擅长挪用乡土写实来说故事的书写策略以及对乡土经验的想像，张系国小说在地域场景或文化色彩的铺陈其实都不比他的社会关怀来得强烈。同时，在张系国写作的70年代，无论是台湾乡土派作家回归乡土的“现代化”历程，还是中国现代小说追寻乡土的写实经验，我们难免会看见作家们以浪漫抒情的笔触来描述“乡土”种种人情风俗。然而，张系国相对而言并没有为自己缔造一个乡愁缱卷、属于他本身的“乡土”。他的乡土固然无从构筑，但他作为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显然以更为自由开放的态度来书写他成长的“土地”。父辈迁台的集体记忆、同辈学人对台湾欲走还留的疑惑和矛盾以及七、八十年代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让他毫无保留地以激进奋亢的写作姿态来述写以上种种。张系国的“乡土”俨然于此复活，他的企图与野心可谓更上层楼。

在乡土文学运动方兴未艾的六十年代末期，黄春明、王贞和、杨逵、钟理和、王拓、宋泽莱等乡土作家云起风涌，各路人马使尽浑身解术，一时将台湾这块土地当成了各样意识形态、文学价值甚至是政治口号的角逐场地。这叱咤时代的乡土文学思潮在台湾文坛的一切功过自有待历史证明。然而，在集中论述张系国与同时代作家竞相呈现台湾土地的风貌当即，张系国《地》一书于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大叙述”中显然未成气候，更何况他后来对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明显说明其写作目的也并不于此。因此，他未及参与其盛便毅然抽身离去，迳自追寻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等海外作家去了。在乡土文学一片喧嚷中，他继承60年代初期旅美作家群的家国乡愁，另寻出口。这群作家驻足彼岸频频回首故国，思睹海那边的一人一物，在特定的距离下毫无忌惮畅所欲言，对故土所感所知盎然纸上，构筑隶属自己“纸上的精神家园”。

这时期的文坛将领看来仿如兵分两路，打造自己的文学江山，究其实，张系国何尝不是立足家园之外来换个角度书写自己熟悉的土地？

如果我们从六、七十年代乡土作家群致力恢复土地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现代主义作家层出不穷追求实验性“纯艺术”这两条文学路线互为参照下去，张系国一贯平稳朴实、淡定索然的叙述文字读来总是欠缺风采，风格意象也略显粗糙。然而相较于同时代作家，张系国能以他自己的叙事风格来表述，并在台湾当代文学站上要角，他书写的用功和用心，皆不可等闲视之。同时，以张系国平铺写实的笔触来处理一般留学人的乡愁，亦恰好避免重蹈於梨华、聂华苓等人略显煽情自怜的窠臼之虞。《地》某些短篇写于张系国首次来到美国布克莱城加州大学念书的时期（1966—1969），他坦言这时复杂的离家心情：“那时刚出国不久，浓厚的怀乡情绪，可以在〈地〉和《亚布罗诺威》里看得出来。”<sup>4</sup> 相较后期《游子魂组曲》所显现各游子放逐的杂烩图，他此刻的心情不过是一般游子离家的情愁别绪，而他小说中的放逐乡愁还未来得及有个完整的拼凑。

张系国在〈地〉的恋乡情结其实一目了然，仿若早已预设自己日后的写作姿态。〈地〉设置了台湾外省两代的强烈对比——李震之和儿子李明，彰显两代对土地不同的情感方式。这种对土地的欲望和想像，首先从大陆退守至台湾的退伍军人李震之在买地与卖地间表露无遗。张系国这里再次触动中台瓜分的政治伤口，而那些因政治悲剧而被迫离乡背井有家归不得的老一辈（李震之、老董、赵麻子）不惜牺牲仅有的家产来确定自己对土地的具体认知，也唯有如此，这些浪子对土地的情感方才得以“根植”。因此，李震之典当唯一的杂货店，宁愿守着传统的农业社会，可是最后这块“石头地”还是垮掉了。张系国显然重新唤起“流浪的中国人”最为原始的集体记忆，<sup>5</sup> 只有凭着这种对土地单纯的欲望和想像，李震之方才有勇气说道：“种田虽然苦，人好像就有了根，就连在地上了，什么都有了个寄托。”<sup>6</sup> 在政治时局纷乱扰攘的1949年，台湾不过是国民党借来以恢复基地的特殊政治空间，时过境迁，二百万中国人只得从“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中梦醒，对他们而言往后的日子即是弃于海外孤岛无止境的放逐。一脉海峡遥遥相隔，“回家”竟是事与愿违。于是，这群寓居域外的异乡人只好重建自己对土地的情感。李震之等人流离失所了半辈子，如

---

4 张系国，《地》，页250。

今渴望靠近土地的决心和韧力其实不难理解。这正是评者冷以焚的感慨：“他们的漂泊，他们的辛酸，铺成自国民革命以至击溃日本侵略之后，近代中国第一首由于政治分裂而流离失根的悲歌。”<sup>7</sup>曾几何时，他乡变故乡，唯有靠近土地，悲歌方才稍歇。

然而，张系国并不愿意看到祖辈失去家园而终日活在患得患失中。作为外省第二代，他坚决表明立场：不愿回到祖辈的政治阴影去。他以知识分子的冷静和智慧，企图整理和建立自己的思维方式。较同时期旅美学人更清楚的是：张系国思索着如何以更稳健的姿态驻足台湾这块土地，而不是仍旧对台湾存有“欲走还留”的矛盾心态。张系国五岁离开大陆随父踏足台湾，使他对台湾很早就有强烈的归宿感。五岁前的记忆毕竟模糊残缺，使他很快地就把“家”的情感倾注于台湾，由此，张系国确切“一直把台湾视为‘家乡’”，更是“少数把台湾当作家的外省人”。<sup>8</sup>然而，如果稍加留意小说中的说词，台湾外省第二代虽然认同这块新土地，然而他们很快又陷入立足还是离开台湾的两难，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毅然选择离开，又不免会因再次为失去家园而患得患失。小禹认同李震之上山办农场：“我们的根是在土地上。离开了土地，我们决不可能生出根来。现代人的许多痛苦、失落的感觉，我觉得都是离土地太远所致”；<sup>9</sup>所以小禹出国念书后，才会百般失落：“想要生根，想要不致失落，一定要靠近土地……”；<sup>10</sup>还有倾一生漂泊的李明，他身上浓烈的流离意味更自不待言：“我们这种人，只配流浪和失落，不配去接近土地……”。<sup>11</sup>张系国道出了两代夹缝于追寻和失落之间的矛盾。然而，在〈地〉这层文字叙述背后，更见吊诡的是：张系国既然一开始就确认这块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所在，那他现在又为何依然绕在余光中、於梨华、白先勇等人“回不去、不能回去”的旧问题上？这不禁让人质疑对家/乡的印象会不会一再成为“流浪的中国人”的梦魇？在原地踏步的怀乡情结中，张将如何突现这代人的思索张力？

5 白先勇以〈流浪的中国人〉为文探讨流亡台湾的第二代作家所表现的放逐主题，其中触及了聂华苓和於梨华的小说。参阅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收入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台北：花城出版社，2000年，页407—415。

6 张系国，《地》，页7。

7 冷以焚，〈失根的悲歌——阐释张系国小说中三种追寻的类型〉，收入《书评书目》第86卷，1980年，页61。

8 简政珍，《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页

〈地〉里的人物从层层乡愁的焦虑和迷失中脱身出来，却又回到放逐的牢笼里。换言之，众人之前汲汲寻找的土地主体只能在彼岸遥遥张望，难以靠近。由是观之，张系国反讽且尴尬的一句话——“假如你真的爱这片土地，你又何必出去”<sup>12</sup>——倒是从此点中了当时许多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心事。然而究其因，“出去”的原由到底何在，确实有待斟酌。外省第二代如张系国等辈因深刻感受父辈有“家”归不得的苦痛梦魇，确实不想留待台湾这个家不是家，国不像国的尴尬地带。与此，历史和当时的整个生活氛围造就了他们对本身身份认同的不平衡心理。台湾，尽管是张系国这辈人选择/逼迫驻留的地方，但心里所承担的焦虑和压抑可想而知。因此，“出去”亦成了另一条逃避的出路。〈地〉里的外省第二代水手李明（李震之的儿子）即是最好的例证。他为了逃避父亲消耗半辈子精力而垮掉土地后的梦魇，毅然放弃女友周玫，“随着船漂泊天涯，让寂寞和回忆腐朽掉自己的心，也决不留下来了。”<sup>13</sup>然而，这一走，又让他更清楚知道自己对家乡那份深刻的眷恋：

那个小镇实在很平凡，也说不上有什么美丽。我认识的那些人也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哪儿都可以见着的。但是我仍旧渴望着回去。那些美丽的城邦和海港，我总觉得不是属于我的，我不能够在哪儿安身立命。只有我的那个小镇，即使它很平凡，却是属于我的一块地方。<sup>14</sup>

在张系国一般平实淡然的笔触里，如此浪漫细腻的文字想像必然是因为作家爱家恋乡情结的感动。“家”，的确是在台湾开始的。与此，张系国确定了自己的家国认同，以及对土地的归属感，更同时确立了台湾即是他日后安身立命的地方。相对于父辈望乡时的怀乡愁绪，外省第二代对新土地的认同和归宿就显得踏实多了。

尽管如此，《地》可视为张系国六十年代末处身异乡对自我审视的一个小结：他在〈割礼〉中写海外中国人对保钓运动的不同态度，是他日后致力于《昨日之怒》的暖身动作；地理老师“亚布罗诺威”对叙事者的启发和哲学思

9 张系国，《地》，页41。

10 张系国，《地》，页55。

11 张系国，《地》，页55。

12 张系国，《地》，页44。

13 张系国，《地》，页58。

考的潜移默化（〈亚布罗诺威〉）；东方留学生在自焚最后几分钟看到的文明世界的颓败（《焚》）；从僵尸世界的虚拟想象回到人类本质的存在意义（《枯骨札记》）；以超乎的想像力赋予“超人”正常人的思想情感来预设人类所不能掌控的未来世界（《超人列传》），以及对科技和道德之间所作的衡量和思考（《流沙河》），张系国无时无刻不是企图从不同视角下来探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责任。如果张系国坚持从〈地〉的乡愁里“出去”，他的去向大抵可在上述几篇初见端倪。自《地》伊始，家/乡已不断作为张系国书写和思考背后的主体，他把台湾这块土地视为跳板以突显一己的叙事方式，从而脱离前辈作家频频回首故乡人云亦云的书写模式。这样的书写力量才是作者不断审视自己和开拓视野的重要一环。张系国的自觉也许可以比拟李欧梵投入两种文化的自身经验。李欧梵坦言，他是本着一种中国世界主义的双重价值来重新构筑他所处的边缘位置，因此才能让他“在中国话语的边缘”立足，同时也“只有在这一边缘地带才感到心理上的安全，甚至文化上的优势。”<sup>15</sup>从《地》各篇看来，张系国企图要立足于“中国话语的边缘”俨然还有一段距离，然而他这时期的创作毕竟只是开步前去，而在加州四年的六篇小说也不过是落足他乡的一个据点，这点张系国确有自知自明，诚如他在《地》一书后记坦言：“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么灰色，没法强颜欢笑。”<sup>16</sup>

回到张系国本身，六十年代末的他只能说未及整理和安抚自己的乡愁，他的创作视景仍然有所局限，即使站在前辈学人/作家的基础上，他对家/乡位置的省思还是有所保留。“没法强颜欢笑”，这话他显然说得言不由衷。作为当时众多留美学人的其一分子，在重建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挣扎的痕迹处处可见。《地》的写作可说是张系国自我检讨和定位的操练期。〈地〉无疑地如同台湾学者简政珍所言，它是张系国小说里甚具重要的一篇，“它不仅是作者放逐母题的具像显影，而且使放逐母题的正反现象交互辩证”，同时也为他这时期的创作典型地划分了他的思维范畴。<sup>17</sup>再次较之于留学生文学行列里或深或浅的煽情经验，张系国的理性叙述反倒是他重新建立土地主体位置的重要过程。在他“越写越迷惘”的过渡里，他何尝不是企图在这个“灰暗的世界里”汲汲寻找一个书写的契合点，以及一个让他安身立命的所在？<sup>18</sup>萨依德探

14 张系国，《地》，页15。

15 李欧梵，《在中国话语的边缘》，收入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社，页

索流亡知识分子时说明了重要的一点：“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sup>19</sup>张系国即是在以一种旅行的方式来不断发现或证明自己立足于台湾。跨越了《地》的“小我”乡愁，日后的游子魂系列才始见张系国构筑意属他的家国想像。

### 三 《香蕉船》的启程：一律死灭？

《地》以后，我们不能否认日后的文学评论者大都围绕在“他（张系国）对台湾强烈的爱心，对土地深刻的认同”展开论述。<sup>20</sup>吊诡的是，张系国后来表现的却是更为放任不羁的“出去”。《游子魂组曲》写的即是不愿，也不能回家的游子（魂）。1973年完成《地》以后，他曾经斩钉截铁宣言：“我拒绝再充当‘留学生文学’这荒谬文学里的荒谬角色。‘留学生文学’是一条死胡同……我既已向‘留学生文学’告别，《地》大约是我对留学生文学仅有的‘贡献’了。”<sup>21</sup>若干年，这话言犹在耳，而张系国却仍然汲汲营营为海外游魂寻找归路，此话不能不再作诠释。

六十年代末以降，自於梨华、陈若曦、丛苏、白先勇等人的留学生文学看来，张系国“告别”留学生小说舞台未尝不是深具意义。这其中或多或少隐喻张系国厌倦留学生小说拖沓繁复、死气沉闷的故事情节，或是作家自己也不安于出国以后那些“灰色”、不“健康”，甚至无法让人“强颜欢笑”的小说。可是，稍加留意他日后的写作动向，这话未免言之过早。《游》所收集的十二短篇和长篇《昨日之怒》于七、八十年代蓬勃的留学生写作中，再次把张系国推向“第三代留美作家的中坚”应非过誉。当然，在张系国对留学生文学的告别宣言里，值得让我们更关心的不应只流于他对留学生文学的贡献，我以为在他更为成熟圆融的艺术审美价值的写作风格背后，他表现于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在家乡与异乡之间各种意识形态的颀颀、海外游子学人想像家国以及异乡生活的心理拉锯、甚至扩至全人类更大的命题——人类精神/身体的放逐与挣扎，才是更为可观的议题。

---

16 张系国，《地》，页251。

17 简政珍，《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页150。

18 引号里的内文参阅张系国，《地》，页249。

19 萨依德·艾华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1997年，台北：麦田，页97。

20 杨牧，〈张系国的关心和艺术〉，收入张系国，《香蕉船》，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页

《游子魂组曲》上卷——《香蕉船》的启航确是张系国走出留学生文学这条“死胡同”的一个出口，在父辈与同辈对台湾认同的情感中，张系国的“出去”显然别具意义。然而，香蕉船所乘载的是来自台湾一群漂泊异乡的孤独游子，他们久久未能肯定航线，也难见归期，更难堪的是游子“浪迹的结局一律是死灭。”<sup>22</sup>然而，张系国对他的小说人物从不讳言：“对我而言，没有生活，没有人的挣扎，就没有小说。”<sup>23</sup>张系国将《香蕉船》的小说人物尤其这群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归纳为“人的挣扎”，并非概括性的说辞。他完书后为自己/读者补上后话：“别人为艺术而创作，是别人的事……我不为艺术而写作，我只为人而写作。”<sup>24</sup>他这番话和后来写作《昨日之怒》时所强调的“并无艺术价值”<sup>25</sup>相互辉映，然而此话对艺术创作的写作者而言实有“画蛇添足”之嫌。张系国又何以忍心抹煞艺术审美的野心，而只着重“人”的文学？《游》下卷——《不朽者》的写作艺术让人耳目一新，足以证明他在落实强烈社会意识的同时，也企图实践其小说艺术。

话说回头，张系国宁可舍弃艺术而尊重道德主题的写作精神，那是因为他真切关怀的还是人类生存的命题。《香蕉船》（1973）里的跳船海员（李先生）和叙述者（黄国权）都是浪迹美国的中国人。黄在回国飞机上被美国警员要求“照顾”遭驱逐处境的同胞时，对他们鄙视的口吻感到难堪——“你是中国人吗……这位先生是你们同国人。他被美国政府递解出境……”。<sup>26</sup>跳船海员最后冒着生命危险在东京过境时再度非法登轮，却“不慎失足落入大货舱，经急救无效死亡。”<sup>27</sup>这些小角色的遭遇其实是张系国小说里最为琐碎甚至不足挂齿的卑微人物。然而，张系国以此批判那些世故讥诮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绰绰有余？留美学生黄国权，因持有美国永久居留证回国相亲多少表现得有点心虚；同座女孩因知道黄的特优权后从冷漠转换热情，又如《本公司》一篇里另一黄国权的翻版“叶”极为反讽的说词：“我做了半年事，寂寞难耐，打算请假一个月回台湾找对象……兄弟别的长处没有，这个国家民族观念，很强很强”。<sup>28</sup>以上小人物的行径和这些留学知识分子的心态相辉映，反讽意味更

---

21 张系国，《地》，页252。

22 杨牧，〈张系国的关心和艺术〉，页6。

23 张系国，《香蕉船》，台北：洪范书店，1976年，页148。

24 张系国，《香蕉船》，页148。

25 张系国，《昨日之怒》，台北：洪范书店，1991年，页300。

是不言自明。

张系国在外国念书研究到教学这些年，他所见到的不外是一群顺应七十年代留美狂潮的知识分子，他们走出象牙塔之后暂且不愿归国，并即时投身美国职场。然而，美国竞争强烈且不重视中国人的现实，让这群处身异乡边缘的知识分子多添了双重的“边缘”心态。这何不是张系国这群处身海外的知识分子感怀身受的？在那个许多旅美学人一味往外跑，偶尔回国却对任何国内事都不屑一顾的时候，张系国关心家事国事的写作态度确实叫人激赏。诗人杨牧说他以文学创作来“证实知识有用，知识分子有用”，这大抵就是他拒绝成为一个只会在象牙塔中腐朽的知识分子。<sup>29</sup>且看他如何道来：

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他自己，他必须绞尽脑汁，想出一条路来。如果他仍自豪于知识分子的孤独，终究他只能成为孤独的知识分子，不了解大众，大众也不能接受他，他一切“杰作”也只有和他一起腐朽在象牙塔中罢了。<sup>30</sup>

张系国了解到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拒绝成为金耀基所言——“孤独的一群”。<sup>31</sup>然而，这群海外知识分子走过於梨华又见棕榈的生命景观，再逐步走向白先勇纽约客自沉湖底的生命悲剧以后，他们何以还是冤魂不散，逐一向张系国笔下的知识分子招魂？这些无家可归终年漂泊海外的游子，张系国几乎全以“死灭”来安置他们，这足以证明张系国的出路即是死路。留学美国至今，台湾是他书写中从未质疑的叙事空间。原本从台湾“出去”，是想要从祖辈流亡异乡的阴影完全脱困出来，然而张系国以海外知识分子的身份游走他乡之时，却发现自己和他笔下许多小说人物一样，未能找到一个立足的定点。台湾，还是异乡，他依然不断探问一个“安身”之“地”。

究其实，“安身”和“立命”对于张系国是两码子的事。那是因为他从开始就知道自己“立命”的地方就是心底的那块土地，即使往后“身”在何处，台

---

26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台北：洪范书店，1989年，页1-2。

27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0。

28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40。

29 杨牧，《张系国的关心和艺术》，页1。

湾就是他作为流亡者的本命。张系国以他笔下最年轻的流亡者——《蓝色多瑙河》里的阿贞来说明这一点。较之于那些狼狈的知识分子，阿贞的形象更见韧度。正如张系国祖辈要忘却1949年的历史记忆，阿贞也想“逃离”文化大革命的苦难经验。她从广州逃至香港，这和张系国《地》里新一代台湾外省挣扎“出去”的情形不尽相同。中国学者刘小枫从社会学的角度来了解流亡文化的本质就更可彰显这些游魂的精神状态了：

流亡就是被放逐，被迫离开家园，流亡话语就是一种不在家的话语，而全权话语是在家的。此外，流亡的，总是个体性的，流亡的话语形式，只能是个体言说个体自己，而非个体言说总体。<sup>32</sup>

阿贞的流亡只是一种远离家的疏离行为，也是流亡者的生存意识形态和所在地全权意识有所抵触而产生的一种消音对抗。可是从乐观处看来，唯有流亡才可以肯定另一种生存的方式。阿贞的出发点正是如此。她从广州逃离香港，又想从香港逃到德国，其中的挣扎，与其说她背负了家乡那头的心理包袱，倒不如说她正努力为自己卸下流亡的梦魇。她逃到香港只因为觉得香港离家乡还不至于太远——“如果有一座很高的山，你站在山顶，还望得见家乡”，<sup>33</sup>恋乡情结溢于言表。然而，残酷的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在香港，她得到一位来自德国学者给她生活上的资助，而她则提供他论文上的资料。她娓娓口述着自己国家在文革时期的惨痛经验，逼于不断地“售卖”国家的历史记忆；她以为香港可以帮她离开过去的苦难，反而却让他深陷另一个苦难之地。除此，她还被怂恿去拍处女裸照，说赚到的钱可以帮忙出版流亡刊物，重要的是“能够拉毛泽东下马，把共产党搞垮”<sup>34</sup>。她努力着流亡的生活，可是，生活最后要把她逼向哪里？

30 夏祖丽，〈理智的寻梦者：张系国访问记〉，收入《书评书目》第五十二卷，1977年，页42。

31 六十年代初期，一群台湾学人奋勇前往美国求学，然而，西方文化毕竟和东方学人传统文化的堡垒格格不入，加上美国极为竞争的工作机会迫使这些海外华人最后零散地处在大学讲堂、研究室、图书馆、餐厅等一角寻找生计。因此，美国的现实社会环境并不如他们所想像中一样，他们无法适应而变得患得患失，终而产生某程度上的文化危机。金耀基就把他们这些海外学人唤作“孤独的一群”。据金耀基在探讨他们心理层次时所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感之产生，基本上是因为他们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外员’：他们职业上的成就并不易使美国人对他们产生‘我群’意识；而中国的历史意识也不易使他们放弃对中国的强烈的认同。”参阅金耀基，〈孤

你好恨自己，为什么总是忘不了那些人和那片土地？……你肯离开香港吗？这儿又有神秘值得留恋的？你宁可远离祖国，远离所有的中国人。德国，这真正无牵无挂的地方！<sup>35</sup>

阿贞显然是无从逃离家园，逃离自己，也难逃她的记忆，因为流亡并不是任情任意地切离一切和流亡者有关的家/国记忆。萨依德的描述就恰好给于这群放逐边缘的知识分子最贴切的解释：

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地模仿者或者神秘的流浪人。<sup>36</sup>

因此，阿贞才会如此“自我调侃”：你爱中国，可是中国不爱你。你只有在一旁守候着，等待她回心转意，对你伸出双臂。到那时，你就再也不需要离开她了。<sup>37</sup>阿贞所到之处即是一种永远无法“在家”的行为，她只能援用流亡的形式与自己这个个体对话。然而，她无法超越流亡的本命，即等于她无法完成“个体言说个体”的游戏规则。尤其当她发现自己无论身在何处都永不超生时，她只有了结个体的生命形式。

《香蕉船》是张系国借流浪者的身份回头思索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的未来。他在完成《香蕉船》之后为这个阶段的写作画下总结：

这些年我到处流浪，和我好管闲事的毛病，不能不说是互为因果的，我唯一真正的爱好就是写作。如果我不能经常接触我成长的这片土地，呼吸到自己国家的空气，我知道我便丧失了我写作力量的唯一泉源，我的存在亦

---

32 刘小枫，〈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收入《二十一世纪》第一期，1990年，页117。

33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6。

34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8。

35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6-17。

完全没有意义。多少年来，我梦寐所思的，便是那片土地。每时每刻，我每一个细胞都呼唤着要回去。<sup>38</sup>

所谓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张系国成长的一块土地。这些年，台湾一直是他身处彼岸时遥遥凝视的时空坐标，也同时成了他书写的唯一力量，尽管在彼邦生活迄今，“他的文学完全是为了台湾而创作的”。<sup>39</sup>诚如成长于荷兰的印尼华侨，也是文学批评家的伊恩·安（Ien Ang）在面对自己矛盾的文化身份时，对吉洛意（Paul Gilroy）的论说加以辩护：“如吉洛意所见，对移民者而言，‘身在何处’已取代‘从何处来’，并成为他们身心寄托之所在。然而只要在主流文化中‘从何处来’的问题压倒‘身在何处’时，想要强迫自己去解释、把自己设定在‘不合常轨’分类位置的冲动便会一直存在。易言之，‘从何处来’与‘身在何处’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这个问题便是构成‘族裔散居’此一概念的因素。”<sup>40</sup>张系国在面对许多和他一样都是处身异乡的海外中国人当即，“从何处来”与“身在何处”是他不得不思索的命题。然而一经“出去”，“回去”却变得“挣扎”起来。张系国看来比同辈作家白先勇残酷多了，他将这些游子魂推向极致——一律死灭。在“出去”和“回去”之间，他何以将他们一步一步引向没有光亮的所在？这确实可以从他自己的解答中找到答案：“白先勇笔下的‘芝加哥之死’里的痛苦，已不复存在今日的留学生中了。广义地看，留学生的问题已不成为问题了。它已扩大为海外所有中国人的问题了。”<sup>41</sup>正是如此，他当初自觉地告别留学生文学的动机就高明多了。

〈水淹鹿耳门〉是《香蕉船》最后成集的一篇，这里逐见张系国经已完全脱离留学生文学的书写形式，而把放逐的层面推至世界人类共存的命题之上。这个放逐世界的杂烩图，其中麇集了来自中国留学生林欣、波兰籍移民的旅馆老板和老板娘、波兰房客东尼和凯蒂、俄国“老教授”，还有许多来自欧州移民的老房客等等，共同拼凑了一个世界放逐图象。同时小说中的芝加哥旅馆位置“一边靠近波兰人区，另一边恰好是黑人区和意大利人区的接壤处”，<sup>42</sup>正隐射放逐地的了无边界；而小说场景藉“旅馆”人来人往流动变貌的意象，

36 萨依德·艾华德，页96-97。

37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26。

38 张系国，《香蕉船》，页148。

39 杨牧，〈张系国的关心和艺术〉，页3。

也正好拼凑了放逐者苟延残喘的流亡本命。凯蒂被酒醉的丈夫东尼鞭打，东尼的暴毙，凯蒂失去丈夫；俄国老教授最后神志不清被送往养老院；林欣对这群相处已久的移民朋友始终耿耿于怀；欧州各移民在旅馆中唱着各国民谣的悲壮场面，在在宣示着放逐命运的悲剧。张系国将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原有的忧患意识和西方漂泊离散的知识分子（diasporic intellectuals）置于同一个天平上，旨在说明放逐者难以逆转的命运。周蕾在〈写在家国以外〉曾注解了克哈奇格·托洛利安（Khachig Tololyan）的一段话：“漂泊离散者是跨国主义的象征，因为他们体现着边缘（borders）的问题，‘边缘的问题’不应是一个目的论的问题。与其说边缘是临时性的东西，到底要归化于永久性的事物，倒不如说边缘其实是一种基本生存状况……。”<sup>43</sup>因此，〈水淹鹿耳门〉里的人物最后有的不免要走向死灭（东尼的暴毙），或者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老教授的神志不清），皆一一应验了张系国曾为浪迹者所施下的毒咒。然而这群浪迹者却努力活过来，这恐怕也是张系国自己料所不及的。他在勾勒一个放逐境地的同时，何曾不也尝试为浪迹者（张系国自己？）证明周蕾所说：一种处于边缘的基本生存状况。

张系国的中国情结和他的民族哲学使他多次为海外中国知识分子铺路，他思及他们所在之处、所作之事、所言之语，尤其在留学生文学狂澜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当即，众写作者都以述写“异乡”为志业，张系国处身异乡来写家乡的书写策略更不能有半步怠慢。周蕾在思索知识分子临处边缘的难题，曾延伸了威廉·萨弗兰（William Safran）的话，或可用以洞悉张系国的苦心：

如果“漂泊离散意识是一种‘离散于家园以外的’生存状况的知识化”的话，那么，‘漂泊离散意识’或许就不单是历史上的意外，而是一种知识现实——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必经之途。<sup>44</sup>

游子魂的下场终究无需过于悲观。作为一个长期定居异乡的海外写作者，张系国自己清楚：“即使这六篇，也并非一片愁云惨雾，至少我不那么想。”<sup>45</sup>

---

40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30.

41 夏祖丽，〈理智的寻梦者：张系国访问记〉，页43。

42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54。

如果周蕾所说，在历史情境以外来看漂泊离散是知识分子走向知识现实的必经之道的話，我們將清楚意識到一種民族話語已在張系國小說中逐步成形。

## 族群散居：政治迷惘中的身份認同

從《地》出來以後，《香蕉船》的海外游魂一直沒有辦法回家。張系國將他們的生命悲劇歸納在“人的掙扎”的範疇里，究其實，張所要探討的即是人類生存的一種精神處境。正如〈水淹鹿耳門〉里宏觀的放逐圖像，海外中國人尤其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無不可視為對身份/文化認同的一種挑戰和超越。與此，他們應該如何自處於離群散居的生活狀況中就顯得無比重要了。霍爾（Stuart Hall）以離散文化（diasporal culture）的視角切入，將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解釋為“一種永無止境的生產，永遠在持續過程中，並永遠構成一種內在，而非外在的再現”，同時因為如此一種內在的再現形式，處身邊緣的知識分子才得以“重新塑造成新的主體，從而發現發言的立場。”<sup>46</sup>因此，我們可以以此切入來理解張如何利用土地主體性，在離群散居的敘事空間上延伸了《昨日之怒》里對海外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另一界面的思考。

《昨》首先要以其字數見長，僅僅是作者“對中國青年政治運動的一個詮釋”卻要以20多萬字來敘述當代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歷史事實——海外保釣釣魚台運動。<sup>47</sup>《昨》以男主角陳澤雄為全知觀點來描述旅美華人对保釣運動的種種態度。同時以此政治運動為背景，述寫了多位參與保釣的英雄人物：陳澤雄仰慕的表妹王亞男自台灣輾轉到美國再回台灣的生活經歷，以及保釣主將——葛日新最終客死他鄉的悲劇。於此，《昨》呈現了一個海外知識分子在原鄉與他鄉之間浮沉而產生迷思的史實故事。劉紹銘的書序首先借助John Hollowell所提及的“新新聞學”或“非虛構小說”的概念來詮釋《昨》這樣一個以海外保釣釣魚台運動為敘事場景的史實，委實已概括此書的敘事體制。<sup>48</sup>《昨》可說一直是張系國“中國情意結”的作祟，也是他在建構身份認同的立場上將歷史現實訴諸於文學藝術的再現形式，而1971年在美国爆发的保釣釣魚台運動既是這情結的根源。於此，張一直強調：《昨》多年的苦心醞釀“尽可能忠实地记载

---

43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1。

44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页21。

45 张系国，《香蕉船》，页148。

下我所看到的海外钓运的演变”。<sup>49</sup>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竟要求读者不要把《昨》当成文学作品，他坦言：“《昨》只能算是个人对中国青年政治运动的一个诠释，并无艺术价值……”<sup>50</sup>

追根究底，《昨》里主、副线情节的铺陈、人物特色的勾勒安排、语言的干净利索以及史实和虚构恰如其分，确实不能抹煞作者的苦心经营，亦不是因为政治小说躲不过“文以载道的陷阱”以及“作者对主题的沉溺”而被评作为作者最坏的小说。<sup>51</sup>相对而言，《昨》的叙事成规几乎构成了张对海外钓运背后的政治立场和批判观点，同时他对此政治运动的触及，也正让我们看见当时海外知识分子在出去/回归、原乡/他乡、中国/台湾、左派/右派的思索模式中的度量。张系国书写海外钓运仅和历史上的保卫钓鱼台运动相隔五年，一切记忆犹新，对参与钓运各人物角色的命运安排和最终归向，其实早在《地》一书收篇的〈割礼〉和《香蕉船》的〈红孩儿〉已略有着墨。张致力酝酿长篇钓运的故事却是他对整个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定位的再次诠释。诚如刘绍铭所言：“这几年来，作者心中有一个结，那就是钓鱼台，而写〈红孩儿〉与〈昨日之怒〉是张系国用来exercise这个心结知性活动的具体表现。”<sup>52</sup>

从《香蕉船》里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毁灭看来，当时期的张系国看似未有足够的耐力来安放他的乡愁，这确实要等到“昨日之怒”以后，张才算是稍微可以收敛之前茫然不安的乡愁。刘再复在〈文学对国家的放逐〉一文里曾将李欧梵“内在放逐”的观念延伸至“放逐国家”（*exiling the state*）更乐观积极的位置。他认为“放逐国家”即有“主动地驾驭国家和超越具体的国家种族观念积极性自由（*positive freedom*），在此自由状态中，作家与国家发生主体移位：国家可以放逐作家，作家也可以‘放逐国家’。”<sup>53</sup>简言之，“放逐国家”即是重新把主体放到作家的本位之上，为放逐者塑造更有意义的精神体系，尤其“当作家确认自己是‘文化负载者’和人类精神价值创造者时，他则只认同作为

46 Hall, Stuart, “The Diaspora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224,236-237.

47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300。

48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300；“非小说小说”或“非虚构小说”乃着重于“非小说”/“非虚构”的体裁特色，指的是“想象力有所不逮的地方，就用史实和社会学的研究调查方法去补充”，因此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参阅刘绍铭，〈小说与非小说〉，收入刘绍铭，《情到浓时》，上海：三联，2000年，页192。

文化生存形式的国家，不认同作为中心权力的国家。”<sup>54</sup>张系国以民族国家为写作本位，不仅说明他重视书写者和国家的内在关系，同时也一再显现他关怀着中国人精神文化的生存形式。准此，我们或可以说张系国认同的是一个“以文化生存为形式的国家”，但是从他笔下依然搜寻“家”的痕迹观之，“放逐国家”的写作哲学对他而言恐怕还是有待努力。

究其实，张系国不过是企图将散居美国边缘的知识分子重新放到主体的叙事视角，然而一场政治运动要达至此目的又谈何容易？《昨》里边思索的不仅是《地》里李明父辈（迁台外省第一代）的无奈，同时伸触了往海外生活/回国的外省第二代，以及更长远的还有海外华侨的命运。诚如张系国的顾虑：

几千年的文化包袱，又被带到海外来，造成这一代海外中国人的分歧。唯一的希望在那里呢？还是在下一代。等到下一代的年轻人长大，也许会忘记这一切的误解和仇恨。但是，下一代的美华，已是不折不扣的华侨。他们不会再关心远东，不会再那么关心中国。就因为他们不那么关心，他们才有可能彼此团结在一起。……他又不甘心成为华侨，他还想做中国人……<sup>55</sup>

于是对张系国而言，要关心中国/中国人的命运，他不得不尝试再一次厘清他们散居海外的位置，而恰时发生在美国的钓鱼台事件正是最好的跳板，让这些海外中国人来认识“我是谁”的重要过程。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辗转异乡的命运：陈泽雄虽然一生平平无奇，但是张系国将他参与其他钓运角色一起行动，从原本的政治冷漠到步步追踪钓运的缘起和过程，陈泽雄还有半点功劳；他所仰慕的表妹王亚男从开始即要一尝美国新天地的宿愿，决意跟随洪显祖这个美国商贾投身异乡，至后来揭破洪显祖不过是满身铜臭气且不择手段的生意人

---

49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299。

50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300。

51 龙应台，〈最好的与最坏的：评张系国昨日之怒与不朽者〉，同2，页52-53。究其实，龙应台对此书的批评确略有过火之嫌，并有欠公平。张系国对主题的沉溺，是他向来对文以载道的要求，他的长、短篇几乎都表现了作者对整个台湾和民族的关怀，这进而形成他特有的书写风格。然而，张系国对类似主题的“沉溺”无不可视为一脉相承于现代中国小说里反映的“感时忧国”。张系国自己承认，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一直影响着他的写作。以“最坏的小说”冠以《昨日之怒》，我以为评论者确实忽略了作者书写主题背后的动机，以及自小说叙事里呈现的一套国家民族的美学观势。

52 刘绍铭，〈钓鱼遗恨：论张系国的昨日之怒〉，载于《中国时报》，1978年11月3日。

才毅然离开，并且投身热血革命青年葛日新；葛日新曾是昔日海外钓运主将，一直不肯和自己的原则妥协，只好放弃化学本行在美国卖包子糊口，最后走上悲剧英雄的死亡之路。他是《昨》里张系国唯一把他推向极致的人物，首先他不能，也不愿意回台湾——“也许就因为我太关心台湾，我反而不能回去……你爱一样东西，爱得越深，感情就越复杂，有时反而会恨它”<sup>56</sup>——对原乡的情感爱恨交织、虚实纠葛，他难以厘清；后来他献身政治、关心中国人的命运却被划为左派，他不理会中国人尤其海外留学生的政治冷感，一意孤行办杂志、放幻灯片简介五四运动和钓运、发表激烈演说等，尽而表现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他同时是迁台外省新一代的典型代表，努力为外省第二代实践了张系国不想重蹈前辈“中国乡愁”而努力“出去”的生活哲学。于此，葛日新奋然全力献身国是，他思索着：“难道我们这一代心都死了吗？难道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安心在外国流浪一辈子？我不相信！只要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一定可以证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并不是冷血动物。”<sup>57</sup>然而，现实中最后仅剩的“昨日之怒”，却是张系国自己料所不及的：

他们愤怒的呐喊，没有人加以理会，促使他们越爱越激烈，有的甚至不惜和自己生长的地方一刀两断。这些年轻人都在台湾长大，怎会不爱台湾？无论如何也有很浓的感情。他们被逼走上自我放逐的路，错误不完全在他们。这些人里面。相信后悔不能回台湾的去的，一定很多。<sup>58</sup>

他原以为钓运是中国民族重新认识自己和认同中心意识的转机，然而保钓之后政治转向的问题，最后使到海外中国人对国家认同产生了更大的矛盾。身份多重的复杂性在同一时间蜂拥而至，又哪是三几个读书人招架得来？海外钓运的失败意味着英雄生命走向尽头，钓运的结束使葛日新无路可退，最后以死终结。张系国的狠心正是他落笔极为畅快之处。如果葛日新不死，张系国显然无力再为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在异乡“立命”。除却妥协，他只好又退回到《香蕉船》当初的“死灭”。然而若是我们细察观之，张系国此时要探寻的已不再是何处安身的命题了。在异乡浮沉多年，如今以海外知识分子更辽阔的叙事位

53 刘再复，〈文学对国家的放逐〉，收入刘再复，《放逐诸神：文论提纲和文学史重评》，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页284。

54 刘再复，〈文学对国家的放逐〉，页285。

55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77。

置来省思整个中国民族的文化身份，张系国“立命”的初衷推演至此可谓更胜一筹。张系国任由海外知识分子在政治转向和身份认同中迂回摆荡，无非是渴望后来在《不朽者》中继续为知识分子厘清他们的精神定位，而类似的主题在《昨》其实已略见痕迹：

妥协。要活着、要出名，就得妥协。鲁迅错了。藏在字里行间的不是“吃人”字，而是“妥协”。中国之道，温柔敦厚。天知道中国有多少个讴歌妥协的字眼。<sup>59</sup>

《昨》写到最后，历经沧桑的王亚男在葛日新死后把他们的孩子带回台湾，确实说明一股新生的力量将会在自己的土地上重生。从台湾土“地”走出来，海外游魂不管是死灭，还是妥协，我们不只一次看见张系国一再发掘土地主体所延伸的身份认同。张系国小说人物无论转向何处何地，他站在台湾这块土地构筑起来的国家认同，以及对整个中国民族的思索才是他自始至终的坚持。

## 五 《不朽者》的回归：何处才是安身立命之“地”？

《香蕉船》之后，张系国决意让接下来的游子魂组曲“要比较愉快、不凄惨一些”，这是他对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作有意识的调整。<sup>60</sup>《游》上卷的浪迹者尤其知识分子被迫逐步走向极致，大概是触痛了张系国自己和海外学人的伤处，他这回才愿意扳回一局，以《不朽者》的姿态重新为他们安排另一去处。海外学人倦鸟知返，留学生文学应当如何安抚主导当代台湾文坛“失根流放”的浪子状态？学人/归人、失根/寻根、流放/回归，虽不失勾勒这时期海外游子的重要图象，却也是张系国书写行为中一再思辨的课题。自1978——年为游子魂“解铃”到“守望”的其中过程，不啻是张系国写作艺术另一阶段的审美落实，同时他重新诠释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命运当即，篇目命名更显明朗利索，张系国誓意走向不朽，当是隔《香蕉船》两年之后蓄势待发的述写力量。始自“人的挣扎”切入探勘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如今他企图逾越生死大限，死灭不再是/无法是唯一的救赎，这次他到底领悟多少？

---

56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51。

57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109。

58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221。

较之前辈诸人，张系国在海外逗留的野心其实并不算大，他很快就让跟前的游魂再次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大抵而言，他在“出去”和“回返”之间的考量，皆因他对台湾存有深刻的认同感。然而，张系国这次如何把一群走向死灭的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引渡回来？回到安身立命的所在，是不是从此就高枕无忧？学者刘小枫对“流亡话语”加以理论化：“外在流亡与内在流亡的差别首先还是土地性的。”<sup>61</sup>《不朽者》的人物所含涉的恰是在土地上的一种“内在流亡”，既流亡者无法认同于群体言说的知识类型，而又不愿意离开故土的一种生存和话语形式。《不朽者》大部分以小我且琐碎的男欢女爱切入，以探勘精神流亡的生命形式。于此，我们看见张系国硬朗尖锐的笔触背面，其实匿藏了这位科学家背后不为人知的敏感细腻。他在书写男女关系大胆裸露的风月情事一点也不觉扭捏，反是灵肉情欲挣扎的关系里，更能凸现张系国一再反思的主题——人的挣扎。这也是诗人杨牧所说的：“……张系国在本行的事业里，每日接触的是电脑，终于对电脑之“非人性”产生反感，这时想到人方才是他所爱的对象，人的挣扎方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sup>62</sup>

开篇〈解铃者〉的叙事身份离不开张系国作家的身份，故事直线发展于叙事者——作家郭竹鹤，雅琴和其丈夫以及丈夫外遇的情节展开。故事说得相当轻便，题材也无特别引人入胜之处。然而我以为，此作却极有可能是张系国藉小说里的作家身份来整理自己残留在《游子魂组曲》上卷的思绪。因此，叙事脉络中不难见到张系国对作家生活和书写姿态的浮想联翩，时而对台北文坛人心难测而心寒，时而检讨时下读者的文章喜好和作者的写作态度。未了，他写到雅琴夫妇相依偎离去而独剩作家一人时，还说上了这么一句肺腑之言：“他们拥有土地及一切，我却一无所有。”<sup>63</sup>虽是说得有点突兀，读者却可感写作人之孤独。张系国笔锋急转，却又在结尾还见曙光：

雅琴和陈医生，他们必须不停不休和看不见的敌人奋斗，小心护持着他们的美满生活。而我永远是匹黑马，是夹在他们中间的未知数。我是零，也是无限大。<sup>64</sup>

〈解铃者〉不禁让读者回想到张系国写作《地》时期的叙述口吻：煽情并

---

59 张系国，《昨日之怒》，页274-275。

60 张系国，《香蕉船》，页148。

好于叙述。然而，有心者若是细察观之，他辍笔两年重新出发的创作意念何止一般。且看他如何细述重新出发书写海外游魂的动机：

当年充满理想办大学杂志的人，现在有的做官去了，有的主动或被动的放弃了理想。我之再度出国，这是原因之一。我觉得很灰心——知识分子到最后还是不免出卖自己，有时候是自己出卖自己，有时候是国家出卖了我们。这个问题引导我写了《不朽者》的系列。探讨的是妥协与背弃的问题。<sup>65</sup>

〈征服者〉（1982）和〈守望者〉（1984）两篇其实最能表现他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立场。单从篇目来看，“征服”和“守望”即可看出“妥协”与“背弃”的两面，于此看来，张系国要重新为他笔下的游魂安身立命是义不容辞了。〈征服者〉愈见张系国尝试写作大胆裸露的情爱缠绵，以主人公执信（诗人）背弃前任情人楚安娜较后又和朱莉莉周旋，写一段饱食情欲而相互倾轧的男欢女爱。同时，作者分别侧写另两个人物——任老伯和诗人Long Long的政治理想和书写信仰。Long Long反复追问——“人若丧失自己的信仰，那还剩下什么呢”<sup>66</sup>，可见知识分子在理想与情欲相挣扎的痕迹。无可讳言，男女情爱纵情放荡，张系国写来一发不可收拾，直至《不朽者》的最后一篇——〈守望者〉（1984）以新闻体开篇，续之从五卷录音带中透露男主人公王照雄对已婚女人丽芬（肉体）的迷恋，同时也侧写有夫之妇在耽溺物质和情欲之间，一再地出卖、背叛和离弃自己的肉体。来到《不朽者》的完结篇，张系国说故事的野心亦趋简单，反倒在建构和叙事手段的艺术审美中，让我们一再反刍上述的写作动机。《昨日之怒》以后，张系国笔下的知识分子（陈泽雄、王亚男）已经回到台湾来，如今要重新立足于这块土地，张系国不得不再次思索这群回家的“台北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们应该如何与自己的土地相处？然而，悲哀的是：在情欲与理想之间挣扎的知识分子最终只能“妥协”和“背弃”，同时以内在流亡的方式在土地上存活。类似的流亡活动即是所谓的精神流亡（Geistes Exil），确实比外在流亡的内涵广泛多了。刘小枫以经历外在和内在流亡的西方哲学家洛赫、戏剧家布莱希特（B.Brecht）为索引进一步说明“

61 刘小枫，〈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页118。

62 杨牧，〈张系国的关心和艺术〉，页5。

63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25。

内在流亡”的形式：

不管生存形式还是话语形式方面，内在流亡都与外在流亡差别显著，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中生存，连漂泊的权力也是不具有的。<sup>67</sup>

《不朽者》所表现的即是这样一群“连漂泊权力也是不具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论述权力只能在情欲欢场上消耗殆尽，而这种漂泊的生活形式却往往更闻之心忧。

《领导者》（1979）、《决策者》（1981）和《不朽者》（1983）都是一再证明张系国的写作艺术愈趋成熟圆融的篇章。龙应台以《最坏的与最好的》相较张系国自己的作品，并多次强调“《决策者》及短篇《不朽者》最能表现张系国艺术的成熟。”<sup>68</sup>无可讳言，张系国写《游》确实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新闻体、录音带《征服者》、问答卷《决策者》、多重的叙事观点《不朽者》，文件、书信体《红孩儿》等不能不说张系国用心良苦，以求多变的创作手段而不将一贯的书写定格，尤其是《游》下卷的表现，龙应台说他来了“一个典型的tour de force（文学的特技表演）”，<sup>69</sup>简政珍说“以风格落实主题是张系国小说的重点”，<sup>70</sup>其中涵义不尽相同。

《决策者》以电脑游戏的程式和考卷问答方式来处理，让人觉得哪怕一个错步就会全盘落索。偏偏主人公张必敬在应接不暇的抉择路上一个错步紧接一个，最后成为令人怜悯的角色。无疑，张系国要批判的是知识分子，然而他同情的也是知识分子。现年56岁的张必敬回忆起13年前在美国奥克兰大学被同事“范叔同纠合印度同僚及老犹太出卖”而失了当系主任的机会，只好回国，并加入光化学研究学会。研究学会人事繁复，13年后张必敬“痛定思痛”，决意向范叔同复仇，本欲巴结高层，不果。张必敬再次被同僚出卖，伤心离台。这其实不过是一个有关知识分子之间权力争夺的故事，可是关键在于张系国说故事的企图不仅于此。《决策者》解读为一篇政治寓言，不难见到张系国背后的政治讯息，同时从他本身浓烈的历史感和他多番在政治小说边缘擦肩而过，更有理由相信他是借政治运动一再为中国民族的定位作思索。<sup>71</sup>小说中多番为“

64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25。

65 龙应台，《画猫的小孩：与张系国一夕谈》，页206。

66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79。

政治”作了多角度的诠释——“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政治是最精纯的人际关系”、“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sup>72</sup>而最为吊诡的是：

政治行为是纯粹理性的行为方式。一切非理性因素，均是决策的资料，而非决策的主体。我辈留学生的最大贡献在此。<sup>73</sup>

我们从七、八十年代的历史情境来看，这些台湾留学生在逗留异乡和回归祖国之间所延伸的矛盾必出于此。〈决策者〉处心积虑的布局昭示了知识分子之间防不胜防的明争暗斗：时而张必敬在美国被同事出卖当不了系主任；时而又因为情人曼倩为争取名分要他和妻子王美梵离婚；本想包庇同谋宋复生来对付13年前出卖他的范叔同却反被刁难，最后他不得不离开台湾回到游子魂的放逐世界里头去。张必敬从问答、选择、填空、解释、作文诸题目中步步皆输，注定一无所得。张系国对知识分子的狠心竟也来至此地步。对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张系国无法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这显然和他的生活经验相关。大学时期曾共同谋事的同窗后来人各有志；台湾国内知识分子对政治理想的冷感和自私；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彷徨无助的定向；再到钓鱼台事件后来各家意见分歧不欢而散，“感时忧国”的张系国确实有他自己的顾虑和忧心。他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批判后来在〈领导者〉一篇说得更为直接：“搞女人，搞贪污，都还送不了命。一碰思想，那就是脑袋搬家的事。”<sup>74</sup>校园里的知识分子理应是社会最好的领导者，但是他们却因心中疑窦而一再停滞不前，最终陷入知识分子自怨自艾的窠臼里：

我开始鄙视憎恨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多么的软弱无用。我们无资格领导任何人。只要施于压力，我们就会缩成一团，甚或彼此出卖。<sup>75</sup>

张系国的“感时忧国”使他有更充分的理由一再沉溺于对知识分子的思索当中，但是无疑地，作者在《不朽者》中以疏离（alienation）的手法来写作，对知识分子直接与强烈的批判是要比《香蕉船》跨前了一大步。

---

67 刘小枫，〈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页118。

68 龙应台，〈最好的与最坏的：评张系国昨日之怒与不朽者〉，页55。

69 龙应台，〈最好的与最坏的：评张系国昨日之怒与不朽者〉，页55。

70 简政珍，〈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页160。

《游》下卷多以知识分子来构筑交错与出轨的爱情视景，最终又陷入狼狈不堪的场面，其中不是知识分子走向绝灭的境地，就是掉入自怨自艾的窠臼里。这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内在放逐中生命道统的体现？《不朽者》里性爱/情欲与知识/权力并置，我们从中思考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定位与身份问题。《不朽者》写的尽是那些有识之士之间复杂的男女关系。他们漠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责任，只是一头栽进感情的纠葛中。小说以十二小节区分段落，前后两节由无关痛痒的小人物陪衬，通过蒙太奇手法对知识分子困陷于情欲枷锁和身份低微的小人物求存于生命边缘，作了一次彻底的对比。张系国把男女关系的错综复杂极致化，那种相互背弃、出卖，并费尽心思揣测对方的权力游戏一再为台湾的知识分子而演绎，读来更是让人耸栗。这要比香蕉船上投海的游魂来得折磨和消耗多了。

《不朽者》掩卷之际，我们不禁为张系国笔下的这群知识分子心痛不已。他们在海外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最终还是在情欲和权力威胁下选择了妥协和背弃，而张系国把他们引渡回家，难道仅要看到如此的下场？同时，让读者疑惑的是：在《不朽者》更为激赏的美学观势下，张系国何故一再牺牲这群知识分子？这群海外知识分子回到台湾这块土地上来，他们避开了一条死路，务必要有更大的毅力和信心来面对台湾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们看见张系国积极探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之际，他显然也着力挖掘人类更积极的精神内涵，续而为他笔下的土地游魂安身立命。比较起那些被逼向死角的《香蕉船》里的人物，《不朽者》里那些尚能对自己命运和生命作出一番努力的知识分子看来要幸运多了。走到这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应该要如此作一番更积极的诠释。

从台湾土“地”出来，张系国笔下的游魂几乎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其中不是留恋异乡而自愿放逐在外，就是逼迫留在异乡而不得回国。当然张系国上述小说中也有部分游魂是政治因素下的牺牲品。即使他们当中有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他们又能否可以在家园的土地上完成最美的生命

71 张系国小说里表现浓厚的历史感可以从他对台湾这块土地的关怀上窥视出来，而当80年代兴盛一时的政治小说被摆上台湾文体主流小说当即，《昨日之怒》曾被列入政治小说的范畴。参阅吕正惠，《小说与社会》，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页173-191。

72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65。

73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66。

形式？《不朽者》里多个短篇的结局显然可以看到答案，这些流亡者尤其知识分子恐怕不太容易完成自己作为台湾一分子的社会责任。这对社会使命相当看重的张系国而言，肯定多少有点失望和难过。因此，这才致使张系国不断为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探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尽管如此，对台湾这块土地，是张系国从未质疑的立命之“地”，于此，他进一步探寻全人类尤其整个中国民族的“立命”之处。诚如张系国自己坦言：“我一直追求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人和土地的和谐关系，始终是我想探讨的对象，亦不断令我感到困惑。”<sup>76</sup>于此，他不断渴望探求一种与土地更舒服的对话方式。至于阅读张系国以上小说中难免会有的悲观，以及张系国书写背后的焦虑和困惑，恐怕只有郑明河（Trinh-T. Minh-ha）解释得了：

书写行为并非抓住瞬间，并非拥有，而是一种游走。……创作需要懂得远离已知的领域，将自己带往不期之地、一个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境地。<sup>77</sup>

张系国的“土地游魂”就是这样的一种游走：一种建构于离散的流动空间里更为积极而有意义的生命情境。

---

74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43。

75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页150。

---

76 张系国, 《昨日之怒》, 页300。

77 Trinh, T.Minh-ha, **When The Moon Waxes Red**. New York: Routledge,1991,p.26.

